

THE SCHOLAR

第12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

文子人

学 人(第 12 辑)

主 编:汪 晖 陈平原 王守常

责任编辑:朱建华

责任校对:朱建华

责任监制:胡小河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插页 4 印张 18.5

字数:480,000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1168-9/I·1088

定 价:19.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 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王汎森 (1)
- 严复的三个世界 汪 晖 (29)
-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君勱 张汝伦 (131)
- 宋恕思想述评 姜广辉 (163)
- “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 杨念群 (183)
- 传统时代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 姜 涛 (239)
- 耽罗的名称和沿革 王 頔 (275)

经与纬

- 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互动及其结果 葛兆光 (293)
- 文虽左右，旨不违中
- 读鸠摩罗什译籍 罗新璋 (317)
- 论伦理政治：一个比较文化视野的观察 任剑涛 (337)

政治自由主义的现代建构

-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读解 万俊人 (369)
- 为国而死
- 一项将死亡与国家联系起来的
- 理论研究 程 炼 (443)

技术与人生

——青年卢卡奇浪漫主义哲学研究 张西平 (461)

中国传统诗论中的颓废概念 吴伏生 (509)

论庾信的诗歌艺术 马 纯 (531)

朱光潜诗境论研究 王攸欣 (551)

作者简介..... (577)

《学人》7—11辑目录 (581)

《学人》致读者 (588)

The Scholar, No. 12

Contents

-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thought: traditional elements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 Wang Fanseng (1)
- Yan Fu's three worlds Wang Hui (29)
- Zhang Junmai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 Zhang Rulun (131)
- Comments on the thought of Song Shu
..... Jian Guanghui (163)
- The convergence of medical and family spaces
in early modern China: the search for ethics
and knowledge Yang Nianqun (183)
- Rural population class structure in traditional times
..... Jiang Tao (239)
- Names and establishments of Cheju Island in ancient
times Wang Ting (275)
- Weft and warp: the interaction of major and minor
traditions, and outcomes thereof Ge Zhaoguang (293)

- Words may go left and right, but their meaning
should not be off centre; On the translation of
Kumarajiva Luo Xinzhang (317)
- Ethical politics; observations from a comparative
culture perspective Ren Jiantao (337)
- The modern framework of political freedom; reading
Rawls's *Political Liberalism* Wan Junren (369)
- On dying for the state Cheng Lian (443)
- Technology and life; the young Lukacs' romantic
philosophy Zhang Xiping (461)
- The concept of decadence in traditional poetic
theory Wu Fusheng (509)
- The poetic art of Yu Xin Ma Chun (531)
- Zhu Guangqian's poe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Croce's aesthetics Wang Youxin (551)

中国近代思想中的传统因素 ——兼论思想的本质与思想的功能

王汎森

内 容 提 要

本文主要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传统如何在近代思想中发生作用。本文以理学为例，说明在一个基本上反理学的时代，理学竟以极复杂的方式作用于其间。尤其是在现代政治行动中产生的种种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二、本文亦触及思想史的方法论问题，认为思想史研究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重建思想的面目；第二是研究它的功能，研究它在各种使用中，如何衍生出无限的意义来。

近代中国思想以反传统为一个主要特色，但是，各种研究又发现传统思维在其中扮演着错综复杂的角色^[1]。以理学为例，“五四”前后思想家多反理学，可是他们的思想中却常又夹有浓厚的理学成分。反理学思想竟然毫不影响其中一部分人对理学的资源作深入而广泛的运用。所以，在研究这一个问题时所应该采取的态度，除了用思想传承的系谱、内在理路，或外在环境来解释，似也应该留意“近代思想家或行动者如何以思想或传统来做事”^[2]。除了探讨思想的本质外，也应及于它后来在各种“使用”之中，所

发挥的历史作用，也就是思想功能的部分。

整体来说，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资源在近代思想与行动中所造成的影响是纷纭多样的。由于思想分子之间原有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从它们的接榫处散开，所以成为互不相干的一堆东西^[3]，这些散开的分子只是材料 (matter)，形式 (form) 已经不存在，它们游离并重组，为新的目标服务。由于它们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形式，所以分子原来在其有机结构中所受的约束不存在了，故分子本身的力量可能被无限放大，产生它们在原来的结构中所无的性质及分量。宋明理学本身原来的一套伦理观及价值观已经不再居核心地位，它的各个分子被收摄到一个个与理学无关的最终的目标上去。这个目标可以是革命，可以是打倒传统，可以是救国，甚至可以是反理学。

所以传统的成分与现代人物的思想既有一对一的关系，也可能完全不然。以本题而言，理学的诸多成分，便不必与行动者所要完成之目标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因为个别的特质皆被以化学的化合作用般重新组织到一个新的结构中，所以在新的结构中也就不再存在着与旧结构的分子之间一对一的对应关系。

大体而言理学思维与近代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理学中主张自然人性论的部分与新文化运动前后道德思想的转变大有关系。第二、它是自我人格塑造运动的凭借。它可以是在思想与道德混乱的时代，维持个体的道德，也可以培养打破一切礼法之人，更可以锻造爱国志士。第三、它是人无限扩大自我主观能动性的凭借，造成心的神化，人的神化，以达成革命或解放的目标。

理学在清代的命运是很曲折的。康熙以前，学分三派，一承东林之余脉，一提倡朱学，一尚考据。在康熙一朝则以朱子学为盛，乾隆后专尚考据，当时王学灭尽，朱学亦微^[4]。可是在道光、咸丰年间，宋学与心学都有再度复兴之势。宋学家一方面讲求致用及维系社会道德，同时也批判汉学考据，康有为一段话相当简要地描述了这一点：

段金坛为巫山令，贪劣特甚。孙渊如为山东粮道，受贿三四十万。可知汉学家专务琐碎，不知道理，心术大坏，若以宋学入手，断无此事^[5]。

晚清朱学复兴的过程无法在此深入讨论^[6]。大体而言，邵懿辰、唐鉴、倭仁、吴廷栋、李棠阶、曾国藩等人是主要倡导人。他们以推阐朱学为主，所崇拜的是朱子、薛轩、张履祥、李光地、陆陇其等人，至于白沙、阳明之学，并不是主要的诉求。此外，康有为没有提到，乾嘉汉学也发展出一种新理学——也就是由戴震、焦循等人所形成的，继承晚明学者的遗波，对理欲等理学范畴重新加以诠释的思潮。在正统宋学家看来，他们入室操戈，偷梁换柱，是理学最大的敌人。

以上两种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都有影响。朱学一派基本上发展成一套在心性上自我锻炼的方法。但后来因为王学一派占上风，所以两者互相吸收、互相激荡，发展成为冲破重围的行动哲学。至于戴震、焦循、阮元、凌廷堪等人发展出的新理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也得到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提倡，与当时解放人类自然欲望的风气及从西方输入的功利主义哲学相糅合而极为盛行。周作人提出的两句口号最为扼要地概括了他们的主张，

“伦理的自然化，道义的事功化。”^[7]

晚清以来，只有极少的士大夫主张理欲截然对立式的道德观念，相反的，主张尊情重欲，尊重人的自然需要为主的思想大为流行。清末维新与革命两个阵营中，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大抵是一致的。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马叙伦、周作人等对此都无异见。康有为主张色欲交合之事，两欢则合，两憎则离^[8]，而且重私^[9]、重情、重奢^[10]、重器、重动，可以说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时候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获得压倒性的支持^[11]，王夫之性“日生日成”之说也得到许多人的信从。他们的态度基本上与明季思想家如颜元、李塨、陈确、唐甄等人相近，也与清代中期的戴震、焦循、凌廷堪、阮元一脉相传。所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理与欲的内容都扩大了。所以这时他们谈的“欲”已不是传统儒者所谈的内容。

这一时期的思想家虽然主张尊情重欲，但是他们的思想有一个细微之处值得仔细分辨。他们固然主张尊重社会大众的情欲，可是在谈到社会领袖个人时，却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化倾向。章太炎评戴震的情欲思想时说它“可以莅政，不可以持身”，也就是将政治的与私人的道德要求分开。在政治上必须满足众人基本的欲望，但对个人的修养并不如此说。蔡元培也是一样，他一方面欣赏李卓吾的情欲思想，一方面却是刘宗周学说的实践者；以最宽容的态度处量众人欲望之事，但以最严格的人格锻炼对待自己。

蔡元培是近代最重视伦理学及其他精神层次之建设的人。早在他考举人时，便已在考卷上答“夫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而这份考卷竟使他中了举人^[12]，这或许反映了当时主持功名的士大夫也已有了变化。他整理中国伦理学史及编纂修身教科书等，皆突出其中尊情重欲，维护女权之一脉。《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讲戴震、俞正燮等人，及《文变》这部在廿世纪初年影响甚大

的一书所选文章，如俞正燮的《妒非女人恶德论》、《节妇说》，痛斥男尊女卑，夫死守节之思想，又在《安徽丛书》第三集的《俞理初年谱》所作的跋文中，主张一种唯理而复有情的思想。

周作人则专心致志于提倡一种新道德哲学，这一哲学以戴震、焦循、程瑶田等几位清儒为代表。这些思想家的特征都是重人权、体人情、重女权、重体谅、尊欲望^[13]、体恤细民百姓，且不抹煞现实常识与人在生物层次的实际需要。他再三致意于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程瑶田《论学小记》、焦循《易余籀录》及俞理初的几篇维护女权的文字，并一再强调“通情时变”之哲学，甚至特别欣赏《易余籀录》中讲“模糊”的一段，无非是希望人们不要以“天理”的高调来责备人、约束人，希望以“模糊”来消解理学的道德严格主义。

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连保守的梁漱溟讲“天理”时也强调它不是封建伦理道德，他说：

大家要晓得天理不是认定一个客观道理，如臣当孝之类，是我自己生命自然变化流行之理^[14]。

又说“孔家”原不排斥饮食男女本然的情欲：

孔家本是赞美生活的，所有饮食男女本能的情欲，都出于自然流行，并不排斥，若能顺理得中，生机活泼，更非常好^[15]。

二

清末民初改造个人、改造社会的思想甚嚣尘上，而在这一波造新人的风潮中，主体性的锻炼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但是在这方面西学并未提供足够资源。尽管 Samuel Smiles 的《自助》(*Self help*)之类的书曾经影响不少青少年，而且实际造就了他们后来的

人生哲学与行事风格^[16]，不过当人们想起自我人格锻炼，自我改造时，大多还是回到宋明理学的传统去寻找资源。^[17]

近代个人主义的发扬与理学式的自我修养锻炼并不相矛盾。因为一个健全的个人应该要他能够做自己的主人，要能对抗情、欲等足以陷溺他的因素。如果能自在地禁绝欲与情，收发自如，才是真正拥有主体性的个人。

他们已经不那么注意程朱、陆王的分别了。为了救天下，程朱、陆王皆可以在一个团体的不同成员中存在，或甚至于在一个人的思维中同时存在。清末在各地有不少肩负政治社会使命的修身团体，如蔡元培于一九〇六年所写《记绍兴志学会三大愿》中论及二十五年前（1881），绍兴周亦辉、王积堂、周味芹、戚升淮、程伯索等人所组的志学会。其中周亦辉是程朱派、王积堂是陆王派，但并未闹过意见，“他们用功的方法是看书，写札记，把札记互相传观，加以批评。札记的内容，大约与宋儒语类相类。这是他们修身的部分，但他们的终极目标却不是这个，而是三大愿，‘（一）愿天下无贫人。（二）愿天下无病人。（三）愿天下无恶人。’”蔡元培说：“当时我的朋友，大半是治汉学的，把他们三愿传为笑柄”^[18]。

他们是一群理学家，只有救天下的大愿，不管他程朱、陆王，也不争学派的纯杂，只要求自我锻炼成器。当时有一位笔名放鹤所写的《民德篇》也说，正人心以讲学为急，程朱陆颜李皆有可取^[19]。

省心日记倒是对近代主体锻炼产生过最大影响。宋学与晚明心学革新派的刘宗周，都发展出极为严格的锻炼自我的方法。以清季宋学复兴要将吴廷栋《拙修集》中对倭仁以日记自我诊察锻炼的工夫所作的观察为例，倭仁日记中把每天从早到晚所有念虑、言动，及应事接物，乃至睡梦的内容都记下来以供自己反省之

用。因为是把廿四小时中每一个念头，每一件行为都记下，而不是选择性的写几件，所以整个自省工作严密而有组织，不能有自欺或懈怠。吴廷栋说：

其人笃实力行，专以慎独为工夫，有日记，一念之发，必时检点，是私则克去，是善则扩充，有过则内自讼而必改，一念不整肃则以为放心，自朝至暮，内而念虑，外而言动及应事接物，并夜而考之梦寐，皆不放过，而一一记出以自责，其严密如此^[20]。

他们的修身日记是互相传观的，读后还写意见，吴廷栋读倭氏日记后也写有文章。

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清代宋学复兴的领袖如倭仁、唐鉴、吴廷栋、李棠阶等人的文字极少被提到，反倒是明儒刘宗周的《人谱》影响最大。《人谱》中自省严密的程度决不下于倭仁的日记。而且因为刘氏“意”的哲学，使得他的省身哲学格外严厉。他特别要求人们不只是把念头或行为记下来作反省，还应该恶念头将发动之前，便将它拦截住。最理想的境界则是立定主宰（意）使得恶的念头根本不发生。刘宗周把一个念头的错误也看得非常严重，所以常认为一个念头的错失，可以使人由圣贤转为禽兽^[21]。

《人谱》的影响，在各种官方颁定的学程或个人论述中都有反映。官方的学程中，如一九〇四年（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中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在修身课上规定摘讲朱子小学，刘宗周《人谱》^[22]。可惜一时并未能找到当时的课本，不知道《人谱》的哪些部分被摘用，也不知道小学堂的学生如何践行《人谱》中极为严密的科条。

省心日记对“五四”前以湖南杨昌济为核心的一个修身讲学团体也起过特别的作用。他们修养的主要资粮也是理学，但并不

偏于程朱或陆王。从一九一四年冬到一九一五年九月，每逢星期六、星期日便有大约十个学生到杨昌济家讨论读书及哲学的问题（而毛泽东亦于一九一四年开始将他此时所闻写成《讲堂录》）。如果对照当时杨昌济日记中对社会风习之批斥，可以看出杨氏在这年冬天组成这个小组是为了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而杨氏推荐给这个小组的读物是西洋哲学、伦理学、宋元理学等。从杨氏的记录及毛泽东《讲堂录》看，理学是他们修身锻炼的主要凭借。而且他们也模仿理学家立日记，并把日记呈给老师杨昌济批阅，或是互相观摩批评。黎锦熙回忆说：

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的看书心得自由地进行谈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23]

杨昌济也常有阅某生日记的记载^[24]。这种形式与七八十年前在北京以倭仁等人为主组成的修身团体有相似处。而且他们也多是湖南人。受杨昌济影响的这群学生，后来又组成“新民学会”，会中仍规定会员互相传阅日记^[25]。

除了立日记以自课自省外，抄前贤的修身语录也是一个办法。杨昌济自己有《论语类抄》，而他的学生们也有仿行者，如“曹生志明仿余之类抄《论语》，手抄《孟子》一本，皆用楷书”^[26]，又有“阅张生超所抄修身口诀”^[27]。

杨氏自谓是从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反对汉学，总是谈“大本大源”、克己、存养等问题。曾国藩尤其是他们心目中践履宋学之英雄人物。在这个修身治学团体中产生了毛泽东，他的思想痕迹与杨昌济所倡的宋明理学是相延续的。

在北方，北大的空气中也有一股“惩忿制欲”的理学空气。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中回忆他“五四”前在北大预科时，以一种《明儒学案节本》修养锻炼自己人格的情形：

我在预科三年级，先读《明儒学案节本》，亦读二案

(《宋元学案》、《明儒学案》)。这时读这两本书，不是单纯求知，而是深切的悔悟：一个乡村青年进了首都北京，沾染一种大爷脾气，由习气转入悔悟的过程，二学案予莫大启示^[28]。这一代人常发现民国初年社会的习染太厉害，很想过“向上的生活”^[29]，而宋明理学中为湮消“习心”所发展出来的种种办法，正是少年人用来超越现实习染的最佳凭借，所以陶氏会和当时北大许多学生一样向两学案找救兵来帮助自己“由习气转入悔悟”。

几乎与陶氏同时在北大文科读书的顾颉刚也作了如下的观察——“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30]，而且从他笔下所记看来，当时流行的还是宋儒制欲之学。与顾颉刚同时在北大求学的罗常培也在自传中谈到他当时励行理学的情形^[31]。

很幸运的，我们还可以读到当时一位大学生留下的日记。从中可以看出他想在道德上作系统反省克己工夫的记录。这一份日记之所以能够留下来，与它的作者恽代英是中共创始人的身份有关。

恽氏很年轻时就被国民党杀害了。他活着的时候到处示人日记，并鼓励人作日记。在武昌互助社中：

吾以连年日记示聘三、成章、凯祥等，欲发其作日记之决心……写信及示人日记，皆有甚大助人之意。又颇勉卓然改过^[32]。

他四处勉人立志改过，并每日严格计算自己行为的分数，恽氏所得分数通常不高，有几次甚至低于六十^[33]。他在社中严格规定“分数在六十分以下，罚十文，每降十分，加十文”^[34]，足见社员们确曾实行计算功过总分的办法。规过改过也是社中一大节目。譬如恽代英日记中不时出现这类的话：

与寿民言，凡人自己发现过失，即甚不易。过失发现，而不立改，则浸假又淡忘，不知经若干日，而始又发现矣，故

有屡经发现之过而必经月始改，经年始改。及既改矣，屡始悔以前经年、经月陷溺于过失之可怜，然已嗟无及矣^[35]。

在互助社的帮助和影响下成立的小团体，如民国七年五月成立之辅仁社，规定社员“开会时报告自己的过失及其他社员的过失，皆相约直言不讳”^[36]，他们原先是口头报告，后来“改口头报告为传观日记”^[37]。日新社也是一样——“开会时社员必各携日记，互助展览以资改进”。不过太过严峻便难持久，民国八年二月底开始实行，“到了四月中旬后，社员常多缺席，同时社员因劝戒过失时，言语太激烈、态度太严厉，使人难堪，而犯过失的一方面又不能容纳善言，因此社中便呈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现象和不稳固的精神”^[38]。

当部分“五四”青年热热闹闹地实行修身日记时，准备整肃新文化运动佚荡之风的人也在实行理学家言。理学的道德锻炼在他们身上起着反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如北大的汤尔和，他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最重要的谋臣，在民国八年力主去陈独秀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以致陈独秀南走上海，并将《新青年》南移，逐步地走向共产党。胡适认为这是“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极为重大的变化，故于民国廿五年要求读汤尔和当年的日记，才发现“（民国八年）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今读（先生）七、八年日记，始知先生每日钞读宋明理学语录，始大悟八年三月之事亦自有历史背景，因果如此，非可勉强也”^[39]。

在北京赶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汤尔和是理学家言的信奉者，而其他反新文化运动的人物中更多严格实践宋明理学的人，四川

的白屋诗人吴芳吉（1896—1932）即是一例。吴芳吉是四川江津人，一九一一年考取留学美国，入北京清华学校进修。隔年，以言论过激被除名，后来吴氏教书游食各地，于民国二十年回到四川江津任中学校长。

吴氏对新文化运动多所批评，认为当时有所谓“人类”与“魔鬼”之争^[40]，“夫世变之最著者，至于战国极矣，至于南北朝极矣，至于五代宋元极矣，然其痛根皆甚简单，从未有聚古今中外人类所有之痛而溃烂于吾侪今日之甚者”^[41]。吴氏痛批当时知识分子风习污秽的言论在文集中更随处可见。他同时是激烈的爱国主义者，在四川江津中学担任校长时（1931年），正当九一八之后，他将“像衙门的校门拆了，改建成一座黄河铁桥式的照墙，墙头四个桥墩上都安置一尊牛儿炮，炮口对准东方，表示抗日之意”^[42]。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每周给全体学生讲刘蕺山《人谱》，由他亲手楷书，上石蓝印，发给大家^[43]。在《吴白屋先生遗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帧他手写《人谱》的照片^[44]。他在同一时期，也写下不少爱国诗篇，在这里，《人谱》的锻炼不只是为了成就仁义道德，以防堵新文化运动以来道德散乱的风气，同时也是为了锻炼一批爱国救亡的少年。吴芳吉自己的生活方式似也充分体现理学家严格的纪律，如清晨三点便起床读书，也要全体学生同时起床自习^[45]。又如他在一九三二年四月致死之因，是在火辣太阳下提一包新印诗篇及其它东西从船码头向学校走了七八里地。

那时学校正在培修校舍，后门大开着，以便施工，假如吴先生从后门进校，可以少走三、二里地。然而吴先生不肯行不由径，硬要绕一个大圈子，从大门进校，一到寝室就支持不住病倒了^[46]。

后来诊断是急性肺炎，而江津全城找不到一支盘尼西林，不到两天便以三十九之龄病逝。此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芳吉不肯“行